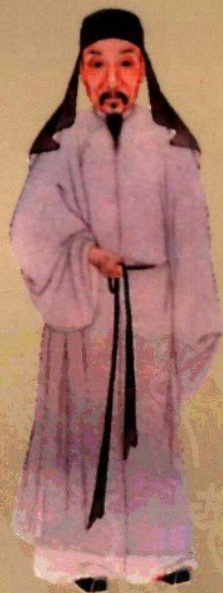


明清之际新仁学

——顾炎武思想研究

周可真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明清之际新仁学

——顾炎武思想研究

周可真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周可真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ISBN 7-5000-7521-9

I. 明... II. 周... III. 顾炎武 (1613 ~ 1682) —思想评论
IV. B2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9727 号

策划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郭银星 陈 光
责任印制：徐继康
内文制作：巴蜀阳光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88390093)

<http://www.ecph.com.cn>

河北省鑫宏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3.75 字数：40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00-7521-9

定价：47.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周可真，男，1958年生。江苏宜兴市人。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1978—1982年在江苏师范学院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获法学学士学位。1982—1985年在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获哲学硕士学位。1996—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先后在《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江海学刊》、《社会科学战线》、《福建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著有《顾炎武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哲学与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策 划 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郭银星 陈 光
责任印制：徐继康
封面设计：BLUEWIND 谢顺富
内文设计：巴蜀阳光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0BZX020)
由苏州大学“211工程”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自序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他被认为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与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旷世大儒”之一^①。开展对其思想的学术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近代以来，在顾氏思想研究方面，已有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较早时，其研究成果最为卓著者，当推梁启超（1873—1929）与胡适（1891—1962）。梁、胡都比较看重顾的学术精神及其治学方法，虽然梁氏对顾的启蒙思想也有所注意。20世纪中叶，以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为代表的一批学界老前辈，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开展中国思想史研究，他们则比较看重顾的启蒙思想。后来的顾氏思想研究大体上就是顺着这样两种研究路向来进行的：史学界一般都比较重视顾的学术精神与治学方法，其代表人物有陈祖武、王俊义等；哲学界则比较重视顾的启蒙思想，其代表人物有萧萐父、许苏民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对顾炎武思想作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成果以《顾炎武论考》（沈嘉荣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和《一代儒宗顾亭林》（葛荣晋、魏长宝著，台湾文津出版社，2000）较具代表性。《顾炎武论考》涉及顾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等八个方面，是迄今为止对顾氏思想论述最为全面的一部学术专著，惟此书重点在“考”而不在“论”，其“论”的比重仅占全书三分之一左右，且其每部分的论述皆是“述”多“论”少，实是以资料汇集为主，其理论分析尚显不足。《一代儒宗顾亭林》则主要论述了顾的学术范式、经学思想、史学思想、理学思想、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其论述深入浅出，条分缕析，简要精当，堪称顾氏思想研究的一部精品力作。

我自1989年开始留心学术界有关顾炎武的研究情况，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于1990年开始了《顾炎武年谱》的写作，至1996年撰成其初稿，后经数

^① 参见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推出的《旷世大儒》丛书。

次修改、校核，始成其书^①。基于对顾氏生平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认知和理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96—1999），撰写了《顾炎武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嗣后，根据答辩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增补，撰成了《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②。

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顾炎武思想研究”（00BZX020）的最终成果形式，是本于作者以往研究成果并吸取他人研究成果写成的，由“启蒙篇”、“爱国篇”、“实学篇”三大部分构成。这一基本构架的设定，是基于我对顾炎武的历史地位的总体认识，这种认识使我对这位特殊历史人物作了如是定位：在社会发展史上，他是中国社会开始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杰出的启蒙学者之一；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是一位坚定而有独特思想和情操的爱国者；在学术发展史上，他是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据此，我以为开展对其思想的研究，理当以其启蒙思想、爱国思想和实学思想作为重点，以澄清这三个方面的思想作为主要任务。

本书所着重研究并力图予以澄清的顾炎武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当然只是迄今为止在我视野中的他的思想的三个主要方面，而非其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不仅本书，其他任何一部历史人物思想研究专著，也都是且仅仅是反映其作者特定视野中为其所研究的历史人物的思想的主要内容，不是也不可能是其全部内容。作为研究者他也不应有穷尽其研究对象的一切方面的企图，因为他所面对的对象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客观上存在着因人而异的无穷的可观察点和解释之可能，而他作为研究主体则不免要受到其时代条件及其个人学识、学养的限制，故无论怎样他都只能从某个特定视角去考察并依凭其特殊而有限的理解力去阐释，这就决定了为考察和阐释的内容不能不具有某种局限性，而无论他自认为是多么全面而客观。因此，本书的局限性亦是不可避免且客观存在着的。

就撰写本书的私意来说，是想对自己以往所取得的顾炎武学术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在其研究范围上有所扩展，程度上有所深入，水准上有所提高，学术上有所创新。不过，本书是否达成了这些愿望，就很难说了。我恳切希望学界同仁对本书提出批评，且不吝赐教。

^① 此书于1998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曾获第七届江苏省优秀图书奖二等奖（2000）、第五届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0）。

^② 此书于1999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后，曾获苏州大学陆氏科研奖（2000）、第四届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2002）。

目录

CONTENTS

自 序	(1)
-----------	-----

导 论	(1)
-----------	-----

一、顾炎武的时代	(1)
----------------	-----

二、顾炎武思想活动之历程	(10)
--------------------	------

三、顾炎武思想的根本性质	(17)
--------------------	------

启 蒙 篇

引 论	(26)
-----------	------

第一章 市民意识及其实践形态	(39)
----------------------	------

第一节 市民意识的形成及其原因	(39)
-----------------------	------

第二节 谋求独立自主的治生活动	(45)
-----------------------	------

第二章 反理学的“仁道”思想	(73)
----------------------	------

第一节 新“仁道”观的历史语境	(74)
-----------------------	------

第二节 新仁道观的基本内容	(88)
---------------------	------

第三章 基于新“仁道”观的社会改革思想 ...	(105)
-------------------------	-------

第一节 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106)
--------------------	-------

第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09)
--------------------	-------

爱 国 篇

引 论	(118)
-----------	-------

第一章 尽“忠”尽“孝”的爱国之行	(124)
-------------------------	-------

第一节 爱国意识的形成	(125)
-------------------	-------

第二节 抗清活动	(131)
----------------	-------

第三节 遗民活动	(145)
----------------	-------

第二章 直抒性情的爱国之音	(186)
---------------------	-------

目
录

第一节 顺治诗	(188)
第二节 康熙诗	(206)
第三章 化“忠”为“耻”的爱国之想	(221)
第一节 宗法立国的思想	(222)
第二节 廉耻立人的思想	(228)

实学篇

引 论	(236)
第一章 实学的思想基础	(255)
第一节 以“耻”为本的经世观念	(255)
第二节 经世观念的历史嬗变	(261)
第二章 贵创新征共识的实证精神	(273)
第一节 轻权威贵创新的怀疑精神	(275)
第二节 重经验征共识的求是精神	(289)
第三章 由“术”及“道”的实学诉求	(302)
第一节 从追求“经生之术”到追求“救世之道”	(302)
第二节 从追求“学识广博”到追求“学有本原”	(309)
第三节 从偏重“下学”到重视“下学而上达”	(314)
第四章 下学功夫和实学思维	(318)
第一节 “学为诗古文”	(318)
第二节 经史之学及其实学思维	(327)
第五章 顾氏实学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340)
第一节 顾氏实学的历史意义	(340)
第二节 顾氏实学的当代价值	(357)
主要参考书目	(367)
后记	(369)

导 论

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当时社会内部新生的经济矛盾加剧了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民族矛盾是顾炎武思想活动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决定了他的思想活动进程及其根本性质。以爱国精神贯穿于其活动过程始终的“道救世”的顾炎武思想，本质上属于伦理范畴，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之“礼”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损益新要求的伦理思想。

一、顾炎武的时代

顾炎武思想是他的时代的产物。论及顾炎武的时代，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当时有否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最近拜读高翔先生所著的《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一书，见其中发有这样一通议论：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源于资本主义萌芽，代表着新兴市民阶级的利益。然而，由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在学术界是一个长期争论，而且很难得出定论的问题，因此，现在谈启蒙思想的人少了，谈启蒙思想源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人就更少了。这里姑且不讨论明清时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但有一点应该是获得学术界公认的，那就是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确实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市场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而市场意识的强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又会推动社会观念的变革。因此，将明清时期的观念变迁置于当时商品

经济发展，阶级关系、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特殊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是正确的，是研究明清思想史、观念史、学术史者应该遵循的基本学术原则。^①

这段议论中，前半段是如实之论，无可厚非；后半段所表达的其论者本人的观点，则有可商之处。高翔先生申明姑且不讨论明清时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采取这个态度自然未尝不可，只是其问题既然被提出来了而且还照旧存在着，对此避而不谈恐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应该承认，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得出定论的问题。不过，学术研究应该尊重的是事实，追求的是真理，却并非一定要追求什么“定论”。没有定论没有关系，只要尊重事实就行。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在知识基础、知识构成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他们对同一事实可能会做出不同判断。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也很难避免。例如，对于明清之际江南苏（州）、松（江）、杭（州）地区的纺织业中普遍存在着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②这一历史事实，有人就认为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并据此得出明清之际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结论；但是，持论相反者却不认为它是什么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他们根本否认明清之际有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存在。这里看似相反的两种事实判断，其实都有其合理性，都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双方都接受了同一个事实，都没有否认这个事实。这里孰是孰非的关键，不在于何者符合事实或背离事实，而在于双方所持有的资本主义概念孰为合理，孰为大家所认可或认同。关于明清时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实质上不过是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之争。

人们应该还记得，在十多年前中国人尚不清楚社会主义能否或应否搞市场经济，这固然说明了其时中国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还缺乏明晰而统一的认识与理解，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中国人对于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还缺乏明晰而统一的认识与理解。从那时到现在不过间隔十多年，虽然今日之中国已在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但这并不足以证明，经过了这十多年之后，人们对于那些本来使其感到困惑难解的问题，已然是“不惑”了，已然达成明确统一的认识与理解了。如果说人们对于这些问题至今都仍未达成明确统一的认识与理解的话，那么完全可以相信，关于明清时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

①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p. 38。

② 《明实录》（万历朝）卷三六一。

的争论还将继续争论下去。

对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探讨。这种探讨是一个历史过程，只要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从而就不会有关于明清时期有否资本主义萌芽的所谓“定论”的出现。以下就该问题所发表的观点，是本书作者对学术界既有的某种观点的某种意义上的认同，其中当然包含了我自己的一些见解。

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体系，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资本主义是所有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同因素的综合体或统一体。判断明清时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仅仅根据某个单一的因素下结论，而是应当全面地考察当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进而根据综合起来的情况来做出判断。

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具体形态和高级形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明朝中后期在其前期农业、手工业获得新发展的基础上空前活跃和繁荣起来的商品经济，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赖以滋生的土壤。当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尤显活跃，其中以“鱼米之乡”和“丝绸之乡”著称于全国的江南苏（州）、杭（州）一带，商品经济最为繁荣。“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使其民赖以市场为生。”^①据嘉靖（1522—1566）时松江人何良俊称，此地较诸正德（1506—1521）以前“今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矣”^②。

与徽州一带纷纷离乡背井，外出从商，以至“贾人几遍天下”^③的情况不同，苏杭一带则是以“居货招商”^④为特点的，由此逐渐形成了作为“商贾聚集之处”的“市镇”。^⑤

苏杭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使这里比中国其他地方较易孕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事实上，史家们在论述这段历史时所列举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典型例子，多半是出自这一地区。^⑥据松江人张瀚（1510—1593）称：

① 明·陆楫：《兼葭堂杂著摘抄》。

②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③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④ 明嘉靖年间《吴邑志》卷首。

⑤ 关于明清之际江南市镇的发展情况，可参阅王卫平所著《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第三章《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繁荣与市场体系》。

⑥ 例如，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0）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就都是如此。案：下文所列举的一些数据材料，均出自这两本书。

“余尝总揽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①与之相应，此地出现了拥有织机二十余张或四十余张、雇佣工匠数十人的手工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这些手工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与他们所雇佣的工匠之间的关系，即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劳资合作关系，历史地来看无疑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而且类似于此的生产关系在当时江南苏、松、杭地区的一些手工行业中是比较常见的（其他地方如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等地的某些行业中也并不鲜见），绝非偶然的个别现象。但就全国范围来说，这种新经济因素还只是出现在少数地区的少数行业，在当时整个手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尚小。因此，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是比较恰当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滋长，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它们之间的互动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从下述事实可以得到部分的说明：苏州的盛泽镇在明初还只是一个仅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而至明末已发展成拥有五万余人、以织绸业为主体的繁华的工商业大镇；湖州的双林镇在明初也不过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到明末则已然成为拥有一万六千多人、以缫丝业为主体的工商业大镇。这些工商业城镇的人口，主要不是土著居民，更多是外来的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有些流民已成为受人雇佣的手工业工人。

随着工商业城镇的兴起与繁荣，明朝中后期社会中形成一个队伍日益扩大的城市工商业者阶层。这个新的社会阶层一般被称作“市民阶层”，它以商人和手工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为主体，也包括一些小行东和手工业者、帮工、学徒等。

市民阶层在明清之际社会中的形成和存在，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即使像上文所提到的高翔这样似乎比较倾向于否定这一时期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也肯定和承认明清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市场的形成”，确实“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而且他在有些场合，也把这个新的利益集团即“有影响的商邦和商人集团”称作“市民阶层”^②。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个市民阶层，作为当时新兴的社会关系的载体或主体，恰恰可以并且也应当被理解为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或主体。这个实体性的客观的社会存在，不仅正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之形成的一个显著标志和客观实在性的证明，它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当时赖以滋生、成长的一个基础性社会条件。

以商人和手工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在经济上强烈要求发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② 参见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p. 39。

展工商业，要求减轻或取消封建统治者的超经济剥削，因而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封建势力（如皇帝派出的税监、矿监）发生着日益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十九年（1601），荆州、武昌之商民先后聚众驱逐税使宦官陈奉，苏州织工、染工奋起击毙税爪牙多人，宦官孙隆被吓得仓皇逃窜。万历三十年（1602），宦官在景德镇的盘剥勒逼激起窑工反抗。万历三十一年（1603），北京门头沟窑工、脚夫和部分窑户在城内举行大示威，迫使皇帝撤掉了税使王朝的官职……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日益成长并与封建经济结构发生冲突的具体形式和典型表现。

与当时客观存在着的新兴市民阶层密切相关的是，明代中叶以后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以市民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相对而言，以往的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则几乎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和妖魔鬼怪。这些市民文学作品，比较集中和突出地反映在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1580—1644）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据统计，在“三言”、“二拍”近200篇作品中，以市民为主人公或涉及到市民的作品约近70篇——其中，《喻世明言》11篇，《警世通言》13篇，《醒世恒言》9篇；《初刻拍案惊奇》16篇，《二刻拍案惊奇》18篇。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直接或间接、露骨或婉转地宣扬一种与儒家尚义贵名、轻视功利的传统价值观念迥然不同的爱利慕富的价值观。^①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刺激与诱惑，以及新生市民价值观的传播与扩散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冲击和诱导，深刻地震撼着整个中国社会，它们的交互作用，促使一直以来起着维系社会秩序之作用的正统价值观发生了动摇，由此引致整个社会在伦理上的思想混乱，乃至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这在顾炎武的《菰中随笔》等论著中就有所反映：

成化以前，士君子品尚养廉，农、工、商贾安分守业，风俗淳厚，治化可称。近年以来，人品各异志，所习者无非悖理乱常，所为者靡不欺上罔法。^②

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至于今日而先王之所以为教，贤者之所以为俗，殆泯灭而无余矣……利之所在，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

① 本段吸取了朱义禄的研究成果，详见朱著：《逝去的启蒙》第二章。

② 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亭林遗书·补遗》。

而人相食者几希矣!^①

社会风气的“变坏”，不仅体现在普通百姓中，更体现在官场中。顾炎武称当时官场风气是“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②正是鉴于此，顾炎武乃大声疾呼：“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③

然而，明末社会中所出现的伦理道德严重失范以及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等情况，其根本原因其实并非是像顾炎武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人心”变坏了，而乃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经济关系的变动，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势必要求社会的政治关系、伦理关系和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明末社会上道德失范和政治腐败的现象，恰是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的上层建筑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了，是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对上层建筑或其中的某些部分或方面，不能顺乎历史潮流地作出相应的改革，上层建筑与内含新经济成份的现存经济关系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其冲突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就势必导致社会上道德失范和政治腐败进一步加剧，从而最终促使社会上守旧势力和革新势力都登台亮相，各显其解决社会矛盾的本领。明末的东林党和阉党，正是在社会上道德严重失范、政治极端腐败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并展开其斗争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1550—1612），因议事膝背皇上意旨被革职还乡，遂与弟允成和高攀龙（1562—1626）等人在家乡无锡东门外重修东林书院，并亲自给书院题写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明了该书院的宗旨及办学的方针。由于高、顾二人均在朝廷做过命官，熟悉官场内幕，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时声名远扬，听者甚众。高、顾等人讲学的中心内容是改革时弊：政治上，主张“公天下以选举”，让中小地主以更多的参政机会；经济上，反对朝廷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四处敲诈勒索、破坏工商、残害人民的行为，主张税收应有定额，城市负担必需合理摊派；学术上，反对偏信和迷信的学风，提倡博学、明辨、深思。他们的这些主张，既反映了广大中小地主的利益和愿望，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拥护。当时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们纷纷“闻风响附”，一部分在朝官员（如叶向高、赵南星、杨涟、邹元标等）也“遥相应合”，由此形成了一个在全国颇

① 《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顾亭林诗文集》本。

② 《日知录》卷十三《名教》，《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本。

③ 《日知录》卷十二《河渠》。

有影响的政治派别，时称“东林党”。

东林党起初在朝廷中颇有一些势力，其他一些党派（如浙党、宣党等）一度遭受其排斥。但为时未久，以魏忠贤（1568—1627）为首的宦官与浙、齐、楚、宣等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一起反对东林党，被东林党人称为“阉党”。当时魏以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其爪牙遍布京城内外。阉党就是利用东厂作为实现其社会集团利益的工具，以极其阴毒、残酷的手段排斥异己，陷害忠良，荼毒人民。对于东林党人，魏阉等更是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横加迫害，曾先后编成诸如《东林点将录》、《同志录》一类的黑名单，以便逐一逮捕之。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因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被锦衣卫缇骑逮捕，并由此累及其他一些东林要员，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相继被捕入京师监狱，与杨涟一起，俱受尽酷刑，先后惨死狱中。高攀龙自杀。其他东林党人也成批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或被杀害，或被关押，或被革职。同时，魏阉下令毁天下书院。东林书院及东林党遂皆告亡。

就在阉党猖獗肆虐之时，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1605—1627）死，信王朱由检（1611—1644）即位，是为明思宗。当年十一月，思宗将魏忠贤流放至凤阳，并榜其罪于天下，旋复命锦衣卫逮治之。魏行至阜城，闻之，与其死党李朝钦双双自缢而死。魏的另一死党崔呈秀闻魏死，亦自缢而亡。次年，思宗又为天启年间被阉党陷害的诸臣平反昭雪。思宗的这一系列举措，极有力地打击了以阉党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同时对于社会上的革新势力也是一种有力的支持。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成立的。

复社是崇祯二年（1629）由张溥（1602—1641）统合各地文社而成立的一个党社联盟，其中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吴中的羽朋社、应社，松江的几社、江西的则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的大社，历亭的席社，莱阳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黄州的质社，昆阳的云簪社等。^①

复社的组织构成情况表明，复社成立之前，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出现了党社组织。这些党社的成员大多为普通的文人学士，也有一些是在职官员；其组织活动一般是采取诗酒唱和、讲学论道的形式。这类社团在明末的大量出现，并非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这个时期

^① 据陆世仪《复社纪略》（载《东林始末》，上海书店，1982）卷一、《国朝山左诗抄》卷九“宋琬”条。（参见拙著：《顾炎武年谱》45.5条）案：匡社，《复社纪略》谓江北匡社，《国朝山左诗抄》则谓吴中匡社，未知孰是。兹姑从《复社纪略》。